

# THE END OF POVERTY

Economic  
possibilities for  
our time



世界不差钱，需求也很饥渴。道德和远见才是当今世界面临的挑战。

## 贫穷的终结

[美] 杰弗里·萨克斯◎著  
邹光◎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THE  
END OF  
POVERTY

**贫穷的终结**  
我们时代的经济可能  
[美] 杰弗里·萨克斯◎著 邹光◎译

THE  
POSSIBILITIES  
OF  
GROWTH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贫穷的终结：我们时代的经济可能 / (美) 萨克斯 (Sachs, J.) 著; 邹光译. —2 版.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0

书名原文: The End of Poverty: Economic Possibilities for Our Time

ISBN 978-7-208-09376-8

I. ① 贫… II. ① 萨… ② 邹… III. ① 贫困 - 问题 - 研究 - 世界 IV. ① F113.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13293 号

责任编辑 石楠  
封面设计 水玉银文化



贫穷的终结：我们时代的经济可能  
[美] 杰弗里·萨克斯 著 邹光 译

出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出品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  
(100027 北京朝阳区幸福一村甲 55 号 4 层)  
发行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印刷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00×1020 毫米 1/16  
印张 20  
插页 10  
字数 292,000  
版次 2010 年 6 月第 2 版  
印次 201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09376-8/F·1966  
定价 38.00 元

# 目录

致谢 .....	1
引言 .....	6
第一章 全球大家庭概貌 .....	9
第二章 经济繁荣的传播 .....	27
第三章 为什么有些国家未能走上繁荣的道路 .....	48
第四章 临床经济学 .....	67
第五章 玻利维亚的恶性通货膨胀 .....	80
第六章 波兰回归欧洲 .....	97
第七章 轻举妄动必受其报：俄罗斯的正常化过程 .....	116
第八章 中国：半个世纪之后再次迎头赶上 .....	131
第九章 印度的市场改革：希望战胜了恐惧 .....	149
第十章 无声的死亡：非洲和疾病 .....	164
第十一章 千年计划，“9·11”和联合国 .....	183
第十二章 结束贫困问题的实际方案 .....	196
第十三章 为结束贫困作必要的投资 .....	211
第十四章 全球紧密合作，结束贫困 .....	229
第十五章 富国能否负担帮助穷国的财力 .....	248
第十六章 神话和魔术弹 .....	265
第十七章 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 .....	282
第十八章 我们这一代人所面临的挑战 .....	297

# 致 谢

这篇致谢辞有双重作用。在写作这本书的过程中，我得到了无穷无尽的支持、慷慨的帮助以及指导。但也许更为重要的是，在面对这个全球化的社会和愈来愈分裂的世界所带来的各种挑战时，我得到了各位同事、老师以及诸多领导人的坚定支持。对我而言，这是一个对他们一直以来的合作和支持表达感谢的很好机会。

我自然首先要向我的家庭表示感谢——我的妻子 Sonia，我的女儿 Lisa 和 Hannah，以及我的儿子 Adam。20 多年来，这个家庭一直努力对“假期”重新定义——比如说听爸爸在东非一个村庄的闷热小屋中作演讲。Sonia 是我的导师、灵感的源泉，并教我各种诊治疾病的方法，她也是我进行发展研究的伙伴和论文合作者。我可以骄傲地说，我的孩子们几乎走遍了发展中国的每一个角落，亲身体验了全球发展所带来的挑战。孩子们对所见事物的好奇是我未来奋斗下去的灵感。在这个家庭所作出的全部努力中，我的岳父 Walter Ehrlich 的智慧，我母亲 Joan Sachs 的判断力，以及我的姐姐 Andrea Sachs 的强烈兴趣，都在为使我的工作保持在正确的轨道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我还要感谢我已故的父亲 Theodore Sachs 对我无尽的精神指引，他作为一个天才的律师，献身于为社会正义而战的事业。

在过去的 20 年中，我很感激在世界各地受到的热情接待，并且幸运地得到很多同事的加盟，他们和我一起了解世界各地的具体情况以及所面临的挑战，并把这些情况植入到对全球化问题的讨论中。我最早在玻利维亚的两位同事是 Daniel Cohen 和 Felipe Larrain，他们成为我终生的学术伙伴。David Lipton 在离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之后，加入到我在拉丁美洲和东欧国家的工作中，他后来积极投身于克林顿政府，为国际政治经济方面的问题出谋划策。在过去的 25 年，Wing Woo 教给我关于亚洲的一切知识，在很多重要的工作中，他一直是我的向导、论文合作者以及联合顾问。在印度过去 10 年令人激动人心的改革方面，Nirupam Bajpai 无论是作为一名敏锐的观察家、学者、论文合作者，还是一名顾问，都表现出其坚定性和准确性。

成为一名成功的经济顾问的最好方式是为成功的政府提供经济顾问服务，我非常幸运地做到了这一点。我最早的经济顾问生涯是在玻利维亚开始的，当时玻利维亚是由杰出的已故总统 Victor Paz Estenssoro 所领导，其高级经济顾问是前总统 Gonzalo Sánchez de Lozada。是他们二位教给了我进行成功的经济改革所涉及的现实政治问题，以及诚实和爱国这些品质在达成更广泛的政治成功方面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在波兰，Larry Lindenberg 在把我引介给团结工会的领导人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团结工会的领导人包括 Adam Michnik, Jacek Kuron, Bronislaw Gerasemek, 当然最重要的是 Lech Walesa。我必须向长期担任波兰总统的 Alexander Kwasniewski 表示敬意，是他使我和 Lipton 获得了波兰的最高人民奖——Commanders Cross of the Order of Merit。斯洛文尼亚总统 Janez Drnovsek 不仅使我了解了过去 20 年中巴尔干地区错综复杂的政治形势，还令我被其卓越的领导力所打动，并使我有机会为一个新的独立国家——斯洛文尼亚——的诞生作出自己的贡献。在俄罗斯，我要感谢我的顾问伙伴 Anders Aslund。我要特别向三位勇敢地反抗旧势力而战的改革者表示特别的敬意，他们是——Yegor Gaidar, Boris Fedorov 以及 Grigory Yavlinsky。

我在非洲的工作要受惠于很多同事以及非洲国家领导人对我的帮助和指导。我尤其要向以下诸位表示谢意，他们是 Calestous Juma, Dyna Arhin-Tenkorang, Wen Kilama, Charles Mann 以及 Anne Conroy。与那种没有根据的通常认为非洲的问题在于政府腐败不同，我在这个大陆上所看到的大量强有力的、具有远见的领导人使我对非洲产生了热切的希望。我尤其要向非洲新一代的民主国家领导人表示感谢，他们包括莫桑比克前总统 Alberto Chissano, 肯尼亚总统 Mwai Kibaki, 加纳总统 John Agyekum Kufuor, 尼日利亚总统 Olusegun Obasanjo, 马拉维前总统 Justin Malewezi, 博茨瓦纳总统 Festus Mogae, 塞内加尔总统 Abdoulaye Wade, 以及埃塞俄比亚总理 Meles Zenawi。

世界各国的领导人承诺把这个世界建成一个公正、平等和法治的世界，通过这些领袖们的远见卓识、领导力以及坚持不懈的奋斗，世界必将成为一体——尽管这个过程可能是曲折的。这些领导人中最重要的是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 (Kofi Annan)，在最近这些年中，他从容的决心有助于避免这个世界的四分五裂。另一个伟大的领导人是 Gro Harlem Brundtland，她在担任世界卫生组织 (WHO) 总干

事期间，给了我 WHO 服务的荣誉。WHO 的宏观经济学和健康委员会指出了一条道路：为穷人进行基本投资。该委员会的同事在他们各自的领域都是无与伦比的领袖人物，包括 Manmohan Singh ——印度的现任总理，全球艾滋病、结核和疟疾基金（全球基金）执行主任 Richard Feachem，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 Supachai Panitchkadie，以及 Memorial Sloan-Kettering 癌症研究中心主任 Harold Varmus。

联合国各个机构都不乏天才和尽职的领导人，在过去的几年中我有幸和他们一道工作。这些领导人包括：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行政长官 Mark Malloch Brown 先生，是他发起了联合国千年项目，联合国人口署主任 Joseph Chamie 先生，Zephirin Diabre 先生，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副主任，是他使我了解了非洲撒哈拉地区的经济问题，IMF 的前董事、现任德国总统 Horst Kohler，他在其任期内推动了全球范围内资源配置的公平化；坦桑尼亚出生的联合国人居中心（UN Habitat）主任 Anna Tibaijuka；联合国环境署极为天才的领导人 Klaus Topfer，以及勇气非凡、充满活力的世界银行行长 Jim Wolfensohn。我还要感谢与世界银行的两任首席经济学家 Nick Stern 和 François Bourguignon 以及 IMF 首席经济学家 Raghuram Rajan 非凡的合作。

很多关于如何结束全球贫困的具体想法是在从事联合国千年项目的过程中出现的，我有幸指导联合国千年项目并且在本书中引用了这个项目的大量成果。如果没有 John McArthur ——我在联合国千年项目中的亲密同事——准确无误的、超越其使命的领导力，这个项目可能从一开始就会偏离轨道。反过来，John 和我也依赖于一个杰出的秘书班子，这些人包括：Chandrika Bahadur，Stan Bernstein，Yassine Fall，Eric Kashambuzi，Margaret Kruk，Guido Schmidt-Traub，Erin Trowbridge，以及那些不分昼夜工作的助手们——Alberto Cho，Michael Faye，Michael Krouse，Luis Javier Montero，Rohit Wanchoo 以及 Alice Wiemes。

联合国千年项目工作小组的各位领导者，以及与其一道工作的科学家和政策专家——都是我的一系列相互关联的领域（农学，水管理，气候学，能源系统，疾病控制以及其他对扶贫和长期发展非常关键的领域）中的老师和引路人。令人高兴的是，这些杰出的世界级科学家中的许多人是我在哥伦比亚大学地球研究所的同事。我很高兴向哥伦比亚大学的各位同事表达特别的谢意，这些同事包括——Deborah

Balk, Wallace Broecker, Upmanu Lall, Roberto Lenton, Marc Levy, Don Melnick, Vijay Modi, John Mutter, Cheryl Palm, Allan Rosenfield, Josh Ruxin, Pedro Sanchez, Peter Schlosser, Joseph Stiglitz, Awash Teklehaimonot, Ron Waldman, Paul Wilson 以及 Stephen Zebiak, 他们在扩展我对可持续发展所面临的挑战的理解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哥伦比亚大学校长 Lee Bollinger 强烈支持地球研究所从事这个项目以及其他很多任务, 我要为此表示谢意。我还要感谢那些曾为联合国千年项目作出杰出努力的任务小组的合作者和任务小组成员。

是无与伦比的 Bono 打开了数以百万计的乐迷和公众的眼界, 使他们分担为全球平等和公正而进行的斗争。我感谢他把这个分裂的世界连接在一起的天才领导能力, 也感谢他从那些新建的联系中所获的能量和承诺。Bono 的亲密助手——Jamie Drummond 和 Lucy Matthews——是全球公民社会 (global civil society) 运动的无与伦比的明星人物。他们每天都在创造奇迹, 把全球发展奇迹推向前沿——这常常是一些领导人漠不关心或者没有注意到的。其他那些慷慨的帮助过我并在促进全球公正方面作出重大贡献的人包括——世界著名的慈善家和金融家 George Soros 以及公共健康的先驱人物 Paul Farmer, Jim Kim 以及 Bruce Walker。

“这本书没有某些人的帮助将是不可能完成”的说法看起来是陈词滥调……但有时这些陈词滥调确实是事实。从开始撰写这本书起, Margarethe Laurenzi——作为一名熟练的抄写员和编辑助理——就提供了无与伦比的支持、专家建议和编辑反馈以使得我们的工作不脱离其轨道并按时完成。Gordon McCord 是我在地球研究所以及联合国千年项目的所有工作 (包括有关这本书稿的各种工作) 中的特别助理。毫无疑问, Gordon 也是未来他们这一代人迎接全球化挑战的领袖人物。Winthrop Ruml 在 2004 年中期从哈佛大学加入到我的团队, 从到达地球研究所开始他就一直是这个项目的关键成员。在本书所描述的 20 年间, Martha Synnott 一直管理着我的办公室, 直到 2003 年为止。Ji Mi Choi 在接下来的一年中提供了无价的帮助。现在管理我办公室的是 Heidi Kleedtke, 她把混乱保持在可控制的范围内, 以使我可以履行自己在联合国、地球研究所以及世界各地的各种耗时漫长的项目中的职责。

几位同事和朋友仔细地、创造性地阅读了本书的手稿, 修正了很多错误、引起误解的表达以及有问题的跳跃。我尤其要感谢 Diane Asadorian, Nirupam



Bajpai, David Lipton, Will Masters, Staci Warden, Wing Woo 以及 Jennie Woo, 他们慷慨地拿出时间阅读书稿并提出富有思想的建议。我也要感谢 Bob Edgar 及其在全美教堂联合会中的同事, 他们回答了我一些关于“基督教对减少全球贫困作出承诺的传统”的问题。

杰出的代理人 Andrew Wylie 帮助我构思了这本书的结构和逻辑, 以使其扩大整个世界对我们这一代人所面对的结束极端贫困的机遇的理解。Scott Moyers (我在企鹅出版社的编辑) 在本书构思到成稿的过程中提供了稳定、清晰、职业化的指导和支持。本书构思到成稿的过程中也凝结着企鹅出版社大量、熟练的专业工作, 以使该项目变得如此之高效。我要向 Scott Moyers 和编辑团队表示感谢。

# 引言

这本书的主题是结束我们这个时代的贫困。但这并不是一个预言，我并没有预测将要发生什么事情，而只是解释什么事情能够发生。现在世界上每年有 800 万人因为极端贫困而死亡。我们这一代人有可能到 2025 年结束这种极端贫困现象。

每天早上我们都能在报纸上读到：“昨天有 2 万多人死于极端贫困。”具体的故事可以使这些数字生动化——8000 个儿童死于疟疾，500 个父母死于肺结核，7500 个年轻的成年人死于艾滋病，还有数千人死于痢疾、呼吸系统感染，其他致命的疾病继续吞噬已经遭受饥饿折磨的躯体。穷人死在缺医少药的病房里、缺乏抵御疟疾的蚊帐的村庄里以及缺乏安全饮用水的家里。他们就这样死去，得不到公众的关注。令人伤感的是，很少有人描述这些。大部分人没有意识到这些每日为了生存所作的挣扎以及大量在这场挣扎中失败的贫困人口。

自从 2001 年 9 月 11 日开始，美国发动了一场针对恐怖主义的战争，不过这也使它忽略了造成全球不平衡的更深层次的原因。美国今年的军事支出为 4500 亿美元，但是如果美国继续只花费军费的 1/13（即 150 亿美元）帮助解决世界上最贫困地区（这些地区由于极端贫困而变得不稳定，从而成为动乱、暴力甚至全球恐怖主义的天堂）所面临的困境，那么其军费开支是不能买来和平的。

150 亿美元仅占美国国民收入的极小部分，相当于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中，每 100 美元里的 15 美分。美国国民生产总值中用于帮助贫困地区的份额几十年来一直在下降，只是美国多次承诺（但未能给予）金额的一小部分。为了解决极端贫困问题造成的危机以及因此涉及的美国家安全问题，美国应当花费更多的钱。因此，这本书是关于作出正确的选择，即基于真正对人类生命的敬畏与尊重从而能够导致一个更安全的世界的选择。

过去的 20 年中，我一直与全世界几十个国家的首脑、财政与卫生官员，以及村民一道工作。我曾到占世界人口 90% 以上的 100 多个国家访问与工作过。从多个角度观察这个世界累积的经验有助于我评价这个世界的真实景况——贫困的原因、

富国政策的作用，以及未来面临的诸种可能性。我的学术及政治生涯中，没有比这些更有价值的了。

我有幸观察到一些真实成功的事例，并对其作出了贡献。这些事例包括——结束恶性通货膨胀，引入新的更稳定的本国货币，取消无力偿还的外债，使呆滞的经济体转变为有活力的、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建立对付艾滋病、肺结核（TB）、疟疾以及对贫困的高 HIV 感染人群进行药物治疗的全球基金。我逐渐理解了在发达国家承诺帮助贫困国家和他们实际上帮助贫困国家这二者之间的巨大差距。通过我的科学研究和实际的顾问工作，我也逐渐认识到我们这一代人手中有着强大的力量可以解决极端贫困人口所遭受的巨大灾难，这个过程可以使我们的生活更安全。

在本书的其余部分，我将解释我在玻利维亚、波兰、俄罗斯、中国、印度、肯尼亚这些社会中看到了什么、学到了什么。你将会看到世界上的所有国家都有机会加入到一个基于全球科学、技术及市场的前所未有的繁荣时代。但是你也会看到世界上某些地区陷入了由贫困、饥饿、死亡组成的向下运行的漩涡之中。对即将死亡的人们宣称他们本来可以生活得更好是没有什么用处的，更有效的工作是帮助这些穷人登上发展的阶梯，至少使他们在梯子底层获得立足点，从而使他们可以自己攀登。

我太乐观了吗？乐观主义或者悲观主义并不是问题的关键。关键的问题不是预测将要发生什么，而是做有助于形成光明未来的事情。这是一项集体任务——对你我而言都是如此。尽管初级经济学教科书鼓吹个人主义和分散市场，但我们的安全和繁荣至少依赖于如下问题上的联合决策——与疾病作斗争，促进科学，推广教育，提供关键的基础设施，采取一致行动以帮助那些最贫困的人。当建立起基础设施（道路、电力、港口）及人力资本（健康和教育）这些前提条件时，市场就成了发展的强有力的发动机。没有那些前提条件，市场就会残酷地绕过世界上大部分地区，使这些地区的人们陷入无休止的贫困和折磨之中。通过政府有效地提供健康、教育、基础设施，以及必要时使用外国援助，联合行动巩固了经济成功的基础。

85年前，伟大的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仔细考虑了大萧条所造成的可怕后果。从环绕其周围的绝望出发，他在1930年写了《我们子孙后代的经济可能性》（*Economic Possibilities for Our Grandchildren*）一书。在那个威胁与苦难的时刻，凯恩斯设想在20世纪末，也即

他孙子所处的时代，英国和其他工业化国家的贫困现象能够终结。凯恩斯强调了科学技术的巨大进步以及技术进步以加速度促进经济增长的能力，而充分的经济增长事实上能够解决困扰人类的世纪“经济问题”，即使人们有足够的食物以及满足其他基本需要所需的收入。凯恩斯当然是对的——当前极端贫困在富国中已经不复存在，而且在中等收入国家中也逐渐消失。

今天我们使用同样的逻辑断言：极端贫困不会在我们孙子一辈的时代终结，而是在我们的时代终结。富国的财富、当今知识社会的巨大力量，以及世界上需要帮助以摆脱贫困人口比例的下降——所有这些因素使得到 2025 年解决贫困问题有了现实的可能性。凯恩斯不知道他的孙子一辈所处的社会会如何使用他们的财富以及百年来为生存奋斗所获得的前所未有的自由。这正是我们所要面对的问题。我们是否有良好的判断力来明智地使用我们的财富，医治这个分裂的世界，结束那些为贫困所压榨的人所受的苦难，以及在各种文化及各个地区锻造一种共同的、人性的、安全的联系和可以分享的目标？

本书将不会回答这个问题。然而，基于对世界经济如果运行到今天这种状况的翔实理解，以及我们这一代人如何运用其能力在未来 20 年中消除仍然存在的极端贫困问题，这本书有助于说明通向和平与繁荣的道路。我希望通过对这条光明道路的轮廓的勾画，使我们更可能选择这条道路。现在，我很高兴与大家分享我对这个世界以及我们时代经济可能性的看法。

# 第一章

## 全球大家庭概貌

### 马拉维：完美风暴

我们于上午 10 时左右到达马拉维的一个小村庄——Nthandire，这个村庄距离马拉维首都利隆圭（Lilongwe）一个小时的车程。我们经过污浊的街道，穿过那些妇女和儿童组成的人群。这些妇女和儿童光着脚，拿着水罐、木柴以及其他杂物。上午 10 时左右的空气是闷热的。在这个南非内陆国家里，该地区以种植玉米为生，家家户户在这片无情的土地上竭力维持生计。今年比往年更加艰难，因为雨水稀少——可能是由于厄尔尼诺（El Niño）洋流的影响。不管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在我们经过的土地里，庄稼都枯萎了。

如果村子里有体力充沛的男子能够在房顶和农田建立一些小型蓄水设施，以收集前几个月降落的雨水，那么我们就不会看到那个上午如此凄惨的景象。但是当我们到达这个小镇的时候，我们没有发现任何年轻力壮的男人。事实上，是老年妇女和几十个孩子在欢迎我们，我们没有看到任何处于工作年龄的青年男女。于是我们便问，“工人去哪了？去地里干活了吗？”负责为我们引路的志愿者悲伤地摇摇头说不，他们几乎全都死了。这个村庄完全被艾滋病摧毁了，几年来艾滋病一直在马拉维的各个地区肆虐。这个村子里只剩下 5 个 20—40 年龄段的男人，这个上午他们也不在村里，因为全部去参加前一天死于艾滋病的一个村民的葬礼。

近几年死亡一直笼罩着 Nthandire。我们所遇到的祖母充当她们孙儿的监护人——这些孩子已经成为孤儿。每一个妇女都有一个悲惨的故事：自己的儿女如何死去，留给她们照顾 5—10 个——有时甚至是 15 个——孙儿的沉重负担。在大多

数发达国家，这个年龄段的妇女已经卸下一生的操劳、颐养天年。现在她们不能停下来，甚至没有片刻的休息，因为这个村庄的祖母以及无数和她们境遇相似的人知道，如果放松一刻的话，这些孩子就将死去。

生存下去的机会很渺茫，不知什么时候生命就完全停止了。如照片一（见彩页）所示，我们遇到一个妇女，在她的土屋前面，有15个已经成为孤儿的孙儿。当她开始向我们诉说她的境况时，她首先指向土屋旁边的土地——地里的庄稼已经枯死了。她的这一小块地大约有半公顷左右，面积太小，即使是在雨水充沛的时候也不足以养活整个家庭。农地的小规模以及干旱的问题被另一个问题扩大了——在这个地区，土壤的养分已经被耗尽，以至于雨水充沛时玉米的产量仅为1吨，而同样情况下1公顷肥沃土壤的玉米产量为3吨。

半公顷土地出产的半吨玉米既不能提供充足的养分，也不能提供（如果有的话）少量收入。由于今年的干旱，几乎颗粒无收。她把手伸进围裙里，取出一把半腐烂的、被虫蛀过的黍粒——这就是作为晚餐的稀粥的原料。这也就是孩子们一天中惟一的一顿饭。

我向她问起孩子的健康问题。她指着一个大约4岁的孩子说，这个女孩一周之前患上了疟疾。老太太背着她的孙女去大约10公里之外的当地医院看病。当她们到达那里时，当天提供的抗疟疾药品——奎宁——已经用完了。尽管孩子发着高烧，这位祖母和孙女还是被送回家里，被告知要第二天再来。

这也算是一个小小的奇迹，当她们第二天经过10公里的艰苦跋涉回到医院时，奎宁到货了，孩子得到治疗并活了下来，尽管形势曾经千钧一发。如果疟疾在一两天内不能得到治疗，那么孩子可能转为脑疟疾，接下来就是昏迷和死亡。每年有超过100万（也许有300万之多）的非洲儿童死于疟疾。可怕的灾难发生了，但事实上这个疾病是部分可预防的（通过在马拉维的贫困地区以及非洲大陆的多数地方使用蚊帐和其他环境控制措施），且是完全可以治疗的。对于这样一种疾病每年夺走数百万人的生命，简直没有任何借口可言。

我们访问Nthandire的向导是一个信奉基督教的义工，一位为当地一家非政府组织工作的热情而富有同情心的人。他和同事尽一切可能帮助诸如此类的村庄。这个非政府组织没有任何资金来源，仅靠一些微薄的捐助维持。这个组织在这个村庄（包括这个具体的家庭）最大的成就是提供了一块塑料防雨油布，将其放置在土屋

的茅草屋顶之下。这块防雨油布可以使孩子们避免完全暴露于自然环境之下，下雨的时候，雨水不会通过屋顶渗透到孩子身上。每个家庭贡献的几分钱就是这个组织能够搜集的全部。

随着我们继续向这个村庄行进，其他祖母们也讲述了类似的故事。每个人都失去了儿女，那些活着的仍然为生存而挣扎。这个村里所有的人都是穷人。附近没有诊所，没有安全的水源，地里没有庄稼，以及很显然的——没有援助。我停下来问一个女孩的名字和年龄，她看起来像七八岁的样子，但实际上已经 12 岁了——营养不良阻碍了她的发育。我问她自己生活中的梦想是什么，她说自己想成为一名老师，并准备努力学习和工作以实现这个理想。我知道如果她在这样一种环境下生活，那么能够活到上中学以及师范学校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对这些孩子来说，上学是一件可遇而不可求的事情。无论上学与否，孩子们都染上了疾病。他们的入学率取决于家庭在多大程度上需要他们取水、砍木柴，或者照顾弟妹及堂兄弟姊妹；也取决于他们是否付得起上学所用的物品、校服以及支付交通费用；还取决于步行数公里路程去学校的安全性。

当天晚些时候，我们离开这个村庄飞往第二个城市 Blantyre，我们要访问位于那里的马拉维主医院——伊丽莎白女王中心医院。在那里，我们经受了当天受到的第二次冲击。马拉维政府渴望以这个医院为基地，开始为大约 90 万感染 HIV 病毒的国民进行治疗的计划，这些人因为缺乏治疗，濒于死亡边缘。这个医院为那些能够负担抗逆转录酶病毒疗法所需的每天 1 美元费用的人们建立了一个宽敞的诊所，这种疗法基于马拉维政府与印度基因药物生产商——Cipla 达成的协议，这家企业是向贫困国家提供低成本抗逆转录酶病毒药物的先驱。马拉维政府太穷了，不能为所有需要治疗的人负担每天 1 美元的费用，所以这项医疗计划最初只适用于那些能自己负担治疗费用的少数马拉维人。当我们访问这家医院时，这个治疗点每天只向能够自己负担费用的大约 400 人提供抗艾滋病药品——一个有 90 万人患艾滋病的国家中的 400 人！其他病人实际上不能得到任何抗艾滋病药品。

我们随一位视察病房与门诊服务的医生弯腰走进一间会议室。他向我们描述了接受抗艾滋病治疗的病人所取得的小小奇迹。药物治疗的成功率几乎为 100%。因为马拉维人以前从来没有接受过药物治疗，所以 HIV 同族没有显示出抗药性。这位医生也谈到他的病人对每天两次的治疗有很强的依赖性，这些病人当然有很高的

求生欲望。总之，这位医生对结果是很满意的。

正当他的总结使我们感到鼓舞的时候，这位医生站了起来，建议我们看一下就在会议室隔壁的病房。事实上，这个所谓“病房”只是一种令人震惊的委婉说法，因为就其实质而言根本不是病房。“病房”里是即将死于艾滋病的马拉维人，病房中没有任何药品。这个房间大约摆放了150张床，容纳了450名艾滋病人，大约三个人挤在一张床上。大多数情况下，两个人头脚相对躺下——分享这张“死亡之床”，另一个人躺在他们身边或者躺在床下面的地上——有时候直接躺在地上，有时候躺在一张木板上，在床下等待着死亡的来临。

房间中呻吟声此起彼伏。这是一个死亡之屋——其中3/4以上的人处于不使用药物治疗的艾滋病晚期阶段。家庭成员坐在床边，抿着干涸的嘴唇，看着他们心爱的人死去。在这个大厅里负责治疗的医生同时也正是掌管这项医疗服务的人。他知道能够做什么。他知道要不是缺乏每天1美元的医疗费用，这些病人能够从死亡之床上站起来。他知道问题不是基础设施、后勤或者药物依赖。他知道问题是这个世界看着每天数百名马拉维人死于贫困而不闻不问，无动于衷。

在数次访问之后，我逐渐了解了马拉维这个国家。几年之前，马拉维共和国的副总统贾斯廷·马拉维兹找到了我。马拉维兹是一个相当好的人，他形象威严、口才极佳，按照多党制民主的各种标准判断都是一个受欢迎的人物。走向成功的道路是漫长的，因为在这样一个贫困的国家——每人每天收入约为50美分或一年人均180美元，大的疾病、饥荒以及气候灾难持续存在，民主注定是脆弱的。令人吃惊的是，马拉维人做到了（民主），在其承受各种灾难的时候国际社会一直给予了支持。

副总统马拉维兹的几位家庭成员死于艾滋病。当我们第一次谈论艾滋病的时候，透过其悲伤的眼神，他向我讲述了其作为国家艾滋病委员会首脑的新责任。他领导一个专家小组设计全国性的防控艾滋病的策略，以应对巨大的挑战。这个小组访问了世界上许多机构——包括哈佛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利物浦大学、伦敦卫生及热带疾病学院，以及世界卫生组织——以讨论如何对付艾滋病。

马拉维政府事实上为治疗其濒于死亡的患病人口曾制定出一项构思严谨的战略，这项战略充分考虑了如下各种挑战——管理一个新的药物配送系统，对病人的咨询和教育，社区扩大服务项目，以及培训医生所需的财务安排。在这个战略的基



基础上，马拉维向国际社会提出了一系列建议，以在5年内帮助1/3的患艾滋病人口（大约30万人）接受抗艾滋病药物治疗。

但是国际上处理这件事情的过程是残酷的。提供捐助的那些政府（包括美国和欧洲国家）告诉马拉维人要大幅削减其建议的规模，因为第一次提出的建议“太雄心勃勃、太昂贵”。接下来的建议草案把治疗人口削减为5年10万人。捐助国甚至认为这个数目也太高了。经过5天的讨价还价，捐助国迫使马拉维又把预算削减了60%——治疗费用减少为4万人。这项被缩减的计划被提交给防治艾滋病、肺结核以及疟疾的全球基金。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负责运营这项基金的捐助者认为有必要再次削减计划。经过长期的努力，马拉维收到的资金只能在5年内拯救2.5万患病人口——这就是国际组织为这个国家的人民所作的死亡担保。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的卡罗尔·贝拉米（Carol Bellamy）正确地把马拉维所面临的困境描述为“完美风暴”（perfect storm）——一场由气候性疾病、贫困、肆虐流行的艾滋病以及长期受疟疾、血吸虫病和其他疾病所困而混合形成的风暴。面对这个可怕的大漩涡，整个世界迄今为止发出了一些看上去高尚的花言巧语，但是很少采取实际的行动。

## 孟加拉国：在发展的阶梯上

“完美风暴”数千英里之外是另一块贫困之地。这里的贫困程度要轻一些。尽管仍有巨大的风险和诸多未被满足的需要，这里的人们为生存所作的斗争逐渐获得了成功。斗争发生在孟加拉国——世界上最为贫困的国家之一。孟加拉国的1.4亿人口生活在两条大河所形成的三角洲冲积平原上，这两条大河是雅鲁藏布江（Brahmaputra）及恒河（Ganges），它们穿过孟加拉国流向印度洋。

孟加拉国诞生于1971年反对巴基斯坦的独立战争。在那一年，孟加拉国发生了大饥荒和动乱——这使得亨利·基辛格时期国务院的一位官员把其称为“国际残障者”。今天的孟加拉国远不是没有希望的。独立以来的人均收入已经翻了近一番，人均寿命由44岁提高到62岁。新生儿死亡率（每1000名婴儿在出生的第一天死亡的人数）从1972年的145降低到2002年的48。孟加拉国的经验告诉我们：甚至是在看起来毫无希望的环境中，如果能够实行正确的战略、选择正确的投资组